

# 帝国的新衣 *The Empire's New Coat*

◎李 强 Li Qiang



因卡·修尼巴尔 (Yinka shonibare) 的艺术作品揉合了丰富的元素, 他将非洲布料、洛可可式的绘画风格、政治、模仿、唯美主义及幽默融合在了一起。

来到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市场, 你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大都市中的各种文化。这里是加勒比黑人所开设店铺在欧洲最大的集散地, 旁边就是亚洲人、葡萄牙人及拉美人士出售食品及小饰物的小商店, 这些人纷纷将他们的本土文化带到了这条19世纪修建的街道上。那些色彩艳丽、图案绚烂的非洲布料(被称为荷兰蜡染布)迎合了当地长住非洲人口的需要。今天, 那些英籍非洲裔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穿着这些布料的衣服来显示他们在文化上的归属感。艺术家因卡·修尼巴尔表示: “实际上, 这些布料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是正宗的非洲特产, 它们是多文化孕育的产物。”他发现这些布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 当时是在印尼的荷兰殖民者将蜡染印花的方法引入了工业化生产, 而英国人又将这些布料从曼彻斯特的工厂出口到了西非地区。后来这些布料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非洲变得非常流行, 以至后来成为了非洲特征的象征符号。修尼巴尔表示: “我比较

喜欢这种对原有含意的误读, 这也是我看待文化的方式, 我认为文化就是人为的产物。”

这种布料现在成了修尼巴尔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画框上像现成的帆布一样铺开, 有时是用过的布料, 他用这些布料来重新创作出18世纪或维多利亚时期的装束及内部装饰。修尼巴尔将这些似乎不相关的元素揉合在一起, 通过这些元素的文化内涵, 修尼巴尔的作品形成了一种非常简洁的暗喻, 他将此称之为来自于全球化的、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混合。

修尼巴尔的作品有着丰富的理性及政治上的微妙之处, 又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一下子就将观众吸引了过来。他首先是一位美学家。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视觉艺术分馆的馆长Suzanne Landau表示: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 无论他是不是艺术爱好者, 都爱看修尼巴尔的作品, 并会有所反应。除了其强烈的视觉效果以外, 其作品还给人提供了许多思考的空间。”她同时又表示: “他的作品不是说教性的, 而是代表了对种族、阶级、性别的一种反思, 同时也将高档艺术与低级艺术结合了起来。修尼巴尔是在尼日利亚及英国长大的, 他并不惧怕成为混

合文化的产物, 他还将这种混杂的文化带入了作品之中。”

修尼巴尔的作品参加了2002年第11届在德国卡塞尔举办的文献展, 这也表明他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迅速上升的重要地位。自从他于1997年在伦敦的史蒂芬·弗里德曼画廊举办个人展览后, 他已经参加了诸如“感觉(Sensation)”这样的重要展览, 并代表英国参加了2001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媒体对修尼巴尔的作品进行了大量报道, 同时其作品进入了诸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及伦敦泰特美术馆这样的顶级公共藏馆以及一些得到私人赞助(如诺顿家族基金及意大利都灵的Sandretto re Rebaudengo基金)的藏馆。其作品有价值1万美元的经过编辑的相片, 也有价值17万5千美元的大型雕塑。最近他完成了两件纪念碑式作品, 价格在20万美元至40万美元之间。

这位有些偏瘦、皮肤墨黑、留着山羊胡子的艺术家表示: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快乐主义者。我认为快乐是至高无上的, 同时也是颠覆反叛的强大基础。”修尼巴尔穿了一件色彩鲜艳的条纹衬衫, 外面是一件略微显灰的外套, 他此



时正坐在位于伦敦东区家中的客厅里, 这是一排模仿维多利亚风格的联排房屋。家中的一面墙做成了书架, 架上摆满了关于艺术、历史、哲学、时尚及文化的书籍。旁边是一个书桌, 桌上堆满了小山般的文稿及目录, 上面均注明了“此件待邮”的字样。其它墙上挂着挑选出来的、色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品, 修尼

巴尔称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那些雄心勃勃、希望举办个人展览的青年艺术家处购来的。在咖啡桌上散乱地摆放着一些关于18世纪法国文化的书籍, 这些是为即将着手的一个项目准备的, 以备研究之用。

他说: “我的灵感通常来自于记忆, 然后再进行大量的研究。”他将其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形成概念、计划然后实施)与拍摄电影相比较。他的旁边放着一根拐杖, 在19岁时, 他的脊柱感染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毒, 导致他头部以下的部位会暂时出现残疾, 从而造成了他行走上的一些困难。

他表示: “这当然会影响我的创作方式, 我也因此变得非常善于委托别人去完成一些事情, 许多人都曾帮助过我。”在修尼巴尔独自一人绘画、进行安装或拍摄相片时, 他会从时尚历史书籍中选择出需要的设计, 然后选出布料, 在需要帮手时, 他会叫来一些有专业经验的人帮忙, 例如生产套装的戏剧服装供应商。他接着说: “我不会独断专行, 但我想我的经历会让我比大多数人对命运有更敏锐的直觉, 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看重快乐的原因, 我还将这种快乐运用到了作品之中, 将它作为作品理性的基础, 对于我深信的许多东西提出了质疑。”

修尼巴尔于1962年出生在伦敦, 其父母是尼日利亚人, 他是在拉各斯这座城市残留着英殖民主义者痕迹的城市中长大的, 这座城市也受到了其它多种文化的影响。修尼巴尔表示: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多天主教学校, 修女在其中走来走去, 这里还有大量的穆斯林, 很多葡萄牙人以前的奴隶也在这里谋生, 当然这里还有非洲的本土文化。”他接着说: “一方面我是看着电视上的Scoopy the Kangaroo(一个澳大利亚节目)、蝙蝠侠与罗宾汉、灵魂列车这些节目长大的, 另一方面, 我在家里要说约鲁巴人语, 到了一所按照英国教育体制建立的严格的私立学校中, 我又能说非常地道的英语。”

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律师, 因此从小上学时就有专车司机接送。夏天通常会去伦敦度过, 他父亲在Battersea有一幢房子。文化多元主义在他看来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 而是实在的生活, 他在拉各斯和伦敦都会过得同样自在。16岁时, 修尼巴尔回到了伦敦, 被送到

英国一所高级寄宿学校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他回忆说: “我到了英国后, 发现如果你是黑人, 那么情况就会对你不利, 这非常令人吃惊, 也非常滑稽。但你要么老想着这些问题, 要么努力变劣势为优势。”

毕业之后, 修尼巴尔决定不再顺从父亲的意志, 他决心成为一名艺术家, 于是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年的艺术课程学习。他后来承认, 他对艺术的喜爱可能与其对严格成长环境的反叛有着很大关系, 同时也是为了纵容他“对视觉诗意及艺术气质的自然感觉”。但他在开始学习的第一个月中就病倒了, 接下来的三年中有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接受物理治疗。他平静地说: “我必须重新开始学做一切事情——自己穿衣、自己吃饭等等, 任何的事情。身体的恢复非常缓慢, 非常艰辛。但随着情况的好转, 我意识到我能够继续完成的唯一事情就是返回艺术学校重拾学业。”1985年, 修尼巴尔进入了伦敦的Byam Shaw艺术学校, 这是一所小型学院, 在那里他感到非常自在。

这位造诣深厚的学院派画家在他入学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了方向的调整, 着手创作充满政治意味的作品。他回忆道: “有位指导老师来对我说, ‘你是非洲人吗? 为什么你不创作一些有关非洲传统艺术的作品呢?’ 意思是我应当创作一些有新原始艺术风格的作品。我是一个现代非洲人, 不知道什么是‘传统的非洲艺术’, 于是我去大英博物馆, 明白了他说的意思。从来没人叫我的英国朋友去创作传统的英国艺术作品, 而他却叫我创作传统非洲艺术作品, 我非常愤恨这位老师话中的含义。它也教会了我去质疑一些陈词滥调, 质疑它们的根据以及含义。”

从那以后, 他就充满了对权威及伪造文化真实性的骗术的质疑。在著名的研究所(被誉为英国年轻艺术家的摇篮)攻读研究生学位时, 他从女权运动理论中发现了一些表现方式来表达他的一些理念。他说: “在看了有关辛迪·舍曼、南希·什佩罗、罗斯玛丽·特罗克尔等艺术家的介绍后, 我意识到自己不必将指派的定位视为是命中注定的, 我可以在模仿或反映中以略带幽默或嘲弄的方式来挑战我与权威的关系。”

修尼巴尔于1994年开始使用荷兰蜡染布进行创作, 他会将这些布料(不是帆布)固定在画框上, 然后在上面涂

上颜料。修尼巴尔的作品通常有多部分组成, 如在“Double Dutch”(1994)中, 在色彩热烈的粉红色墙壁上挂了50件小型的长方形作品, 这些作品均摆放成了精确的方格模样。

在修尼巴尔的作品中, 体现得最多的主要还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花花公子及贵族行为的主题。他的装置艺术作品《勇敢与罪犯的对话》(Gallantry and Criminal Conversation)将该主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作品是基于艺术家对18至19世纪贵族的盛大出游活动进行考察后创作出来的。这些贵族的青年男女打着接受文化教育的幌子被父母送去游历欧洲, 而据修尼巴尔考察, 这种旅行实际变成了他们对性解放的亲身实践。在他的作品中, 一个按照实际尺寸制作的18世纪马车悬挂在头顶, 18个无头的人身模型穿戴着荷兰蜡染布时期的装束, 正在寻找作乐。

修尼巴尔赢得国际性的认可的时间还不长, 仅有五年时间, 他认为现在观众还正是处于了解他的过程当中。他表示: “因为我的出身, 人们期待我创作出一些教育性的作品, 但希望现在他们能够意识到我的作品中还有许多幽默的成分。”

1. 勇敢与罪犯的对话(局部) 综合材料 因卡·修尼巴尔
2. 秋千 综合材料 因卡·修尼巴尔
3. 恰恰恰 综合材料 因卡·修尼巴尔
4. 亨利·詹姆斯和亨德里克·安德森 装置 因卡·修尼巴尔

